

北海文史

第十一辑

经济·政治

北海是古人发财的宝地

西汉初的合浦(即今天的北海,有史可据。下同),已经是内陆商贾争相前来发财的宝地了。《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都把两粤、海南和越南北部沿海“划”为南海“经济区”,该区有“处近海”水运发达的区位优势,兼有“多犀象、毒冒、珠玕、银、铜、果、布”等资源优势,外通“蛮夷”,内联荆楚,商贸发达。处于“经济区”中心的合浦、徐闻二个港口,先于番禺(广州)成为通往西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故“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且看事例:

西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谏议大夫王章获罪死,其妻流放合浦,就是这样一个女人竟然能在合浦贩卖珍珠暴发,最后携巨款赎回被没收了的家产。

同时期的徐闻港区,商贾云集,多“积货物于此,备其(中外商人)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云:‘欲拔贫,诣徐闻’。”(《元和郡县志》)以后历代均不乏印证资料,限于篇幅,不赘。

当时南海“经济区”形成的条件,除了区位优势,还有如下“软环境”的形成:在汉代,“海内为一”大统一局面比秦朝更为强化,汉皇朝继而推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开放政策,结果出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举国商品流通活跃的局面。到了武帝时期(仅半个多世纪),中央财政充裕到贯钱的绳子因久不动用而朽断;太仓储粟丰足至霉坏不能食。商品丰富、手工业进步、百姓致富欲望强烈,为向海外寻求市场拓展准备了物质的技术的和思想上的条件。为此,北海在中古时期成为吸引中外商贾的发财宝地的原因,便不难理解了。

(《北海日报》1993年8月20日)

南珠史实及传说

南珠得名种种

南珠，宏观上是两粤海域所产珍珠的泛称，微观上即北海市属县合浦珍珠的专名。

南珠一名，是日南珠和南国珠的缩词。唐李白诗：“相逢问疾苦，泪尽日南珠。”日南，汉置郡，两广部分和越南南圻属之。又唐马总著《意林》说：“必南国之珠而后珍。”南国，岭南地区；国，郡也。唐诗“红豆生南国。”是岭南又称南国之证。故知南珠一词起源于唐，宋、元、明、清已普遍沿用了。

南珠作为合浦珍珠专名，是明末清初广东人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中有“合浦珠名曰‘南珠’一语下的定义。

产珠的合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合浦”应当含东起雷州，西止防城广阔海域，这一带古称“雷廉珠池”，从“雷廉至交趾六池”间都是南珠产地。狭义的“合浦”，最早指北海市涠洲岛海域，“其地产珠”，是“(合浦)郡人采珠之所。”宋朝以后，产地已北移至合浦县东起英罗港，西止北海冠头岭沿边海域了。

合浦南珠因品质优越而居广东南珠之首，故《广东新语》亦有“东珠不如西珠，西珠又不如南珠”的评价。英国李约瑟则认为“中国珍珠必产雷廉”的为佳。因此之故，珍珠成为合浦祸福相倚的天生尤物，把合浦人民折腾了两千多年。

瑰宝乎祸胎乎

合浦珠池所产的天然珠，因质优和量大而赢得“南珠”美名。大自然对合浦的独钟厚爱并未使此方百姓幸运，而是相反。

综观两千余年的合浦珍珠史，莫不贯串着珠宝拥有者是谁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亦莫不围绕是开放、改革；或是保守、闭塞二条路线为转移。二条路线集中于“合浦珠还”的掌故之中。

“合浦珠还”或者“珠还合浦”有正史与野史二说。

正史见《后汉书·孟尝传》。是说合浦地方“海出珠宝而不产谷实”，居民不懂耕稼，唯凭入海采珠与前来贩珠的中外商贾易米为生。因地方官贪鄙苛索，关

闭珍珠市场，人民生活来源断绝，出现饿殍遍野惨象，海里有灵性的珠蚌“愤”而“徙”（迁移）到交趾邻境安家落户去了。合浦从此成为夜海无光的黑暗世界。

东汉顺帝遴选贤能的会稽人孟尝前来合浦这片“开放经济区”任太守。孟太守针对前任弊政进行全面的改革，先从开放珍珠市场着手，不到一年，合浦经济由恢复而腾飞，人民生活丰足，珠蚌因此从交趾“迁”还合浦，夜海重放珠光。“合浦珠还”因之盛传不衰。孟尝这位革新的政治家和清官一直与合浦山川永存。

野史情节亦附丽于“还珠”二字。明朝是官方在合浦采珠最盛的朝代。从朱元璋开始，开创了派内官到广东沿海坐镇监采珍珠，鱼肉人民的先例。合浦受害特甚，人民痛恨这班狼如豺虎的走狗，因此编造如下故事：

话说合浦白龙珠城海面的杨梅池，有颗烛天照地的大宝珠，惊动了北京紫禁城中的皇帝，于是专差亲信太监前来白龙坐镇，务必采得宝珠。珠蚌有二尾巨鲨守护，珠民在太监威迫下不知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终于使这颗光彩夺目的宝珠落到了太监手上，阉宦连夜起程，护送用紫檀盒装载的宝珠回京复命讨赏。不料刚到白龙附近的杨梅岭，宝珠破盒而出跑回海中去了。太监沮丧地折返，再度驱珠民下海卖命，又不知死了多少人，再获宝珠。一位老珠民建议他把腿股割开，藏珠肉内，即可将宝珠带出去。太监无奈，只得照办，然后拖着痛腿跨马起程，果然安然过了杨梅岭，径直来到粤北梅岭地界。岂料宝珠又破肉而出，无影无踪。太监惊懊愤怒至极，再折返合浦白龙，欲找这个老珠民出气。原来这老珠民是个“五保户”，捉弄了这太监之后便“从贼”造反去了。太监悲愤交加，无法交差，在白龙吞金自戕了。这是白龙城中有座太监坟的由来。

原来“割股藏珠”传说，并非无中生有，是与北海地区古代开放贸易史实有关。限于篇幅，只能另篇介绍了。

（《北海日报》1993年10月28日）

商会长联与“广府”入对北海的贡献

近日，广东省佛山、江门、珠海三市市委书记访问北海，引起笔者回想起一些往事。几十年前，在北海的早期开发中，“广府”（包括以上三市）人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清朝末年“广府”商人曾大批到我市，与我市商人联合组成了北海

商会，对北海的市政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记得当时商会里悬挂着一副引人注目的朱漆黑字木板长联，它记录了北海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上的横向联系。现将全文誊录，以飨读者：

北连象郡，南接羊垣。埠辟通商，角胜全球分一帜；

海以航来，山凭梯至。几研成务，统筹利市会群材。

上联说的是北海地理位置，与广州(秦朝属象郡)南北相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两地的共同目标，是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角胜夺帜，发展现代经济以振兴中华。

下联意指北海与广州之间，海陆交通便捷，可以“航海”(轮船)“梯山”(公路)相通，这与上联地理密切的概念相照应。最后说几经波折然后组会的指导思想是，为了荟萃人材，集中智力，统一筹划来实现均沾经济效益的总目标。在思想性方面，不但反映了开放口岸必须赶逐世界经济潮流的新思想新观念，在写作技巧方面，采用“碎锦格”的体裁，巧妙地把“北海商务分会”六字，嵌入句中，读起来浑然自然，毫无牵强。

(《北海日报》1987年6月16日)

北海——外国人眼中的宝地

北海作为大西南通道的区位优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早在1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令世人瞩目了。

当北海尚被国人视作偏荒而不屑一顾之时，英国人早已一眼觑定这块弹丸宝地了。咸丰初年(1851)英国商船“兹伊亚”号由船长可尔率领，首次进入北海水域进行测量。同治五年(1867)，再次进入北海港测量的，又是英国军舰，次年(1868)，法国商船跟着前来涠洲海域测量，当年便在法国出版比例尺为1:18600的《北海港图》。接着是法国天主教远东传教会趁涠洲岛禁初开及时派遣神甫进岛传教并建设教堂，成为精神统治的岛王。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迫使北海对外开放，应该说这是英国人对北海方方面面早已了如指掌和处心积虑的结果。当英国在北海夺得关税主权并第一个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和税务司公馆的光绪三年(1878)，德国亦迫不及待地派遣船只对涠洲岛南湾进行详细的测量，同

年以 1:45699 比例，绘制了编号为 2062 的《涠洲南湾海图》在美国出版发售，并附有详细的文字记录。自 1851 年至 1949 年中，有关东京湾(北部湾)海图先后在国外出版的共有 27 种，出版国家有英、法、美、德和日本等国。海图的出版发行，引起国际社会对北海的瞩目，北海顿成各国轮船公司和商业集团的角逐场。1876 年至 1937 年，相继插手北海航运的轮船有英、法、德、葡、日、奥、丹、美等国籍，先后开辟了 8 条国内与国际航线，其中也有中国招商局的轮船参与运作，但终非外轮竞争对手。

由于各国“有识之士”对北海地理位置的情有独钟，到光绪末年(1908)，侨居北海的外籍人士计有英、法、德、葡、美、丹、瑞士、挪威等国的共 300 多人，他们所以“乐居此土者，以水土和平，饮食便宜……余物均可就地购办”之故。除商船外，各国军舰也因侨民交涉事件随时进港，北海港成为外国“兵轮商船，往来如织”的繁忙口岸。

1886—1901 年，外国资本集团在北海设立商务机构的有德、法、英、葡、美、日等国，其中葡萄牙和德国驻有国家级的代表。因此，各有关国家在北海设立领事馆已是势所必然。

光绪三年(1877)至 1949 年，外国在北海设领事官的有英、法、德、奥、葡、意、比等国，设领事馆的有英、法、德三国，其他国家均委托三国驻北海或驻香港的领事馆代办。其中法国领事馆存在至 1949 年北海解放前后。

随着经济政治的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渠道也选中北海。法国天主教会把涠洲教会作为钦廉四属和湛江地区教会的领导核心。英、德、法、美也相继在北海设立基督教会，各教会举办的事业机构如医院、学堂、育婴堂等亦遍布市区。以致在清朝末年，北海便矗立起由 22 栋组成的哥特式洋楼群。万国旗出现街头，形成南国边城特别的城市风采。

旧事重提，旨在说明北海的地缘优势早已名声在外了。

(《北海日报》1995 年 12 月 7 日)

还珠故郡官吏廉贪故实

千古传颂的“合浦珠还”，是因为东汉太守孟尝兴利除弊，进行改革开放和

廉政惠民，从而成为垂范后世的政绩所致。孟尝的历史功绩，更主要的是合浦地方廉政优良传统的发轫。使到合浦二千年的历史，无不以廉政与“还珠”双簧为主旋律。

合浦郡后来改名“廉州”，起源于“廉州”一名，由此更分派出“廉江”、“廉泉”、“廉阳”等地名。这些地名，对于历代“牧斯土者”的地方官吏，多少也起到自警、自律和自标的良性作用，这种廉政传统，亦成为历代皇朝中枢遴选合浦官吏的标准。为合浦地方志乘辞典充实了非常可贵和震烁古今的内容。典型的是：

宋朝廉州太守(汉为刺史)危祐，清介自持。有人进献一柄名贵实用的地产工艺品——聚珠扇以图巴结。他立刻想到自己身为“廉州”长官，不能受献而玷辱州名!峻拒不纳，还把来人训斥了一番。

北宋改郡为州，宋真宗赵桓颁布《敕文》，特别用“眷合浦之名邦，有还珠之遗训。将令剖竹之臣，复效还珠之守”的话来“教育地方干部”，要他们学习廉州官吏的廉政传统。

明朝是合浦因珍珠罹祸最惨的黑暗朝代，采珠太监与地方官狼狈为奸，鱼肉人民，罪行罄竹难书。正德朝任广东布政司的吴廷举来廉州作政务考察，特地写了一首《大廉山》的诗质问地方官：“行李纷纷游宦子，几人不愧大廉山？”你们凭什么说自己是清官呢？最好让卸任时行囊中夹带的是什么作结论吧！

有正必有反，无反不崇正。历代皇朝为了巩固政权，都无例外地特别重视合浦地方官的素质要求，是因为这个珠宝之乡历来却又是贪官污吏的温床。

从汉朝开始，合浦郡“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贿”（《后汉书·贾琮传》）。南北朝时期，在合浦当官的“在任者常致巨富”（《南齐书·王琨传》）。“前后使者例多贪纵”（陈书·王励传），唐宋以后，合浦贪官污吏就更多了。白居易在送别来合浦做官的朋友诗中特别告诫行人“莫爱囊中珍”。很说明问题。

方志中极少有为贪官污吏作反面立传的事例，这是中国“优良”的国情传统，使我们无法了解宋元明清以来那些“率务峻民以自封”的蠹虫。有幸的是历代却不乏“好事者”在笔记杂著中为他们记了一笔倒帐，使他们无法逃避历史的鞭挞。

远的不说，民国时期的合浦“县长”李本清、夏秀峰，北海市政专员陈椿熙等大贪官，至今仍落得“骨朽人间骂未消”的可耻收场。

(《北海日报》1993年11月29日)

清代廉州监狱的陋规

明清以来，廉州府境素以“山寇海盗”出没频繁出名。主因是政治腐败和地理特殊所致。故廉州府、县亦以酷刑峻法著称。虽然，自嘉庆以后，修订《大清刑律》旨在使刑具和施刑条文化，刑具形制规格和用刑标准都比前代明确，但无法制止滥设刑具和施刑舞弊的事实。可从廉州府县监狱的陋规说明。按照“刑律”，一般小偷、债务纠纷和通奸等轻犯入狱，不得用枷，罪虽比上述为重，但非命案，审讯时所用笞、杖、板、夹等等都不得用一号刑具……但是犯人交到行刑的皂隶狱卒手里。他们就不管这一套，用刑轻重全由犯人贿赂多少而定。任你再世“包青天”也管他们不着。所以有江洋大盗免受皮肉之苦，而小过贫民却饱受肉体摧残的。

监禁期间，犯属探监和送衣食如不懂得“孝敬”狱卒规矩的，任你三跪九叩也属徒然。虽有个别好心狱卒，但受不了同事指责孤立，也得横下心肠。犯人出狱也有“送监鬼”例规：家属必备三牲或五牲酒饭香烛到狱中给狱卒们代“送监鬼”，否则据说“监鬼随身”，会再吃官司。这些牲醴酒饭不用说都成为狱卒们的美餐。如果犯属不搞这套或过于吝啬，对不起，就请你多委屈几天吧。据说冯子材当年曾因小过进廉州监狱，虽有当地贤达彭元辅保释，因举目无亲，无法送“监鬼”，狱卒亦不买彭老爷的帐，留难数天才出监门。一般小民就不用说了。这种陋规直到本世纪30年代初仍旧照行。无怪前人有“囹圄狱吏尊”的说法了。

(《北海日报》1992年4月23日)

北海港今昔

北海港最早的一张海图是英国在十七世纪测绘的，其目的无非是想把北海当作它的殖民地；法国不甘心由英国专控北海，在1890年前后，对北海赖以依存的命脉——北海南宁铁路方案已勘察制定。美国人于1917年也来染指，一个测量队横渡太平洋来到北海，勘察钦州至株州的铁路线……都以北海为出发点。外

国政府对北海可谓“厚爱”到极点！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怪象。

北海合浦人对乡土厚爱至深至诚，立下“角胜全球”的振兴宏愿，1917年，两地商会筹组的“廉州铁路有限公司”诞生，公布了北宁铁路干线，包括灵山、博白二条支线的整体规划，估算4千万美元总造价，80万人口每人5美元的承受能力。不料这个可行方案夭折了。官方文件说是法国政府“干涉，事未果行。”北海海关档案纪录是当地人“对此缺乏热心”。原来“缺乏热心”的仅是不愿北海港原状有任何变化的驳船主、船工、码头工和内陆驮运夫等少数人，但他们绝不能构成阻力，真正作俑者却是清朝政府。他们被法国1898年借口广西教案交涉兴兵北部湾事件吓坏了，匆忙把北宁线建设权出让来换取苟安，这是法国干涉的真缔（法国铁路筑不成也有较复杂的历史背景）。北海港的前程被冻结了。

40年代日寇入侵海南，北海港航道惨被无数罹难的中国船员渔民的血凝固了，老态龙钟的海港休克了八年。

50年代初，地角沙嘴出现了一座木码头，苏联进口的重型农机由此卸岸。一现的昙花并未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可它首次纪录了北海港不用接驳的历史。1954年开挖外沙西港，仅属小闹小打的玩意，未成气候。

慰藉的是，今日的外沙内港已有能容2千吨的轮船二艘并泊的小型码头以及27座专业性码头，当年的英国“太古”船也可以靠泊了，各种装卸机构配套齐全，内港年吞吐力可达60万吨。超出了建港初期的预想。可是，这是北海港在今天应该有的规模吗？

北海对外开放的春风，溶解了闭港多年的层冰，抵港万吨轮船与日俱增，深水泊位的出现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曾经是百年来有志振兴之士多次幻灭的美梦——从1930年北海市政专员的建港方案到1973年北海港务局的建港规划——在今天才成为现实，一座耗资少，建程短的万吨级深水泊位，遏阻着咆哮的逆浪矗立于天然航道之旁，她是北海开放五周年历史伟绩的突出标志。泊位要延伸扩展到适应世界经济潮流，北海港的历史要继续谱写新章，历史的使命在挑战，我们该怎么办？

（《北海日报》1989年4月19日）

鸦片进口北海知多少

据北海海关档案，从1897年至1911年经北海港输入的鸦片烟土(官方行文讳为“洋药”)累计为1970担。扩散区包括合浦、钦州、灵山、防城、博白和玉林各县。据M先生调查，每10名中国人中便有3人吸毒，如按每人每天消费烟膏2钱，每担烟土时价为港币480元(北海海关《1892—1901年十年报告》)，和当时上述各县人口总数400万中烟民占百分之三十计算，每年由北海口岸外流的该有4亿港币。这个数目意味着什么？

旧中国的关税壁垒并不是维护中国利益的屏蔽；而是相反。而今重新对外开放，难免有精神烟土的输入。然而今天新中国的海关主权完全属我，有森严的维护本国利益的关税壁垒为干城，决不能“因噎废食”，妨碍改革开放的深化进行。

(《北海日报》1990年7月12日)

北海早期的机器工场

北海市在建国前是个半殖民地的商业消费城市。但由于港口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远较内地各县为早。因此，先进的机器设备的工场也较早地在这里出现。只是因为它与商业经济相比，所占比重太小，故未被人们所注意。

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经有中外商人合办的，以内燃机发电的“电灯公司”。这是北海人最早享用到的先进科学成果。光绪二十七年(1901)，继有本市商人利用外资组建的“怡和公司”，从英国格拉斯哥进口内燃机驱动的园盘式锯木机一台，它可自动调节锯件的厚度。一次可锯木板十二块，在高德安装接领锯板加工业务。该厂还附设有木料仓库一座。其锯件主要是“红毛泥”(水泥)的包装桶板和“东洋车”车厢的板材。这算是北海最早的现代化机器加工工场了。这台机器的运转生产，作为一个奇迹哄动了全市，市民纷纷前往参观，啧啧称奇。

宣统元年(1909)，原电灯公司解体，“保兴电灯公司”继兴。这个纯由英国教会资办的企业，因发电成本高，发电量不大，用户有限，不久又停办。民国八年(1919)，北海、廉州商人集股成立“廉北电灯公司”，承顶“保兴”原套设备，并予扩充，厂房租用民房(在今中华一巷左近)，发电量仍远未满足日益发展的市镇居民需要。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电灯暗如“香火”，只供电到晚上十时。军

军阀混战时期，“红头军”（头扎红布的滇军）进入北海，看见电灯感到新奇，就把它割断拟作提灯带走，谁知竟吃了触电的苦头，此后再不敢碰这个玩意了。这个插曲，说明现代科学文明输入北海远比内陆地区为早。

1919年，北海高德建造并安装成功第一艘木壳机动船，俗称“电船”，是近海口岸和内河交通运输较先进的工具，高德造船工人在当时已经掌握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了。可以说，这是北海造船工业从传统技术过渡到现代技术的转折时期。

其后，电动设备也用于食品工业了。1920年前后，北海的面坊和面线（即面条）厂相继使用了马达驱动机器生产。当时畅销钦廉地区的“福寿鸡蛋面”便是机制产品。

1931年，北海、廉州商民集股创建“珠光电力有限公司”。通过陈铭枢、香港商社的关系，从德国购进一台世界名厂“西门子”产150千瓦的火力发电机。这是当时桂南地区最先进的发电设备。“珠光公司”拥有厂房一座，职工五十人。是为北海第一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企业。

（《北海日报》1986年7月22日）

北海茶楼酒馆竞争的历史点滴

海珍品丰富易得，玉成北海饮食文化发达。早期“开放”的窗口，吹进省港之风，食客如云，名厨辈出。晚清至民国，是南路官僚军阀宴乐之地。满汉全席洋洋百肴，山珍海味，飞潜动植，冷热素荤诸品纷陈，非北海莫办。清末“洋务局”外事接待；“八属”时期军阀头目弹冠相庆；抗战前官绅们歌舞升平，饮宴酬酢，通宵达旦。难怪身居台湾的张发奎将军生前对北海美食记忆犹新了。

20年代至30年代，市区固定加流动人口不足3万，竟能容大酒家4至6家和众多“二厘馆”长期存在，东家极少转换。为什么？

笔者与几个生前经营酒馆多年而知名的人士交往中所得讯息，可作答案。他们彼此间是竞争对手，各有一套绝招。旧事追记，不知可为当前饮食业走出低谷之助？

内部管理抓“人头”。旧酒店茶楼内部管理共同点是使“伙计拍硬档”，狠抓雇员“人头”，一是使厨房（含红、白案）少吃、不拿、省料；二是使楼面（服务员）

不赶客(优质服务);三是使买手(采购员)不“打斧头”(报大数)。办法分别是抓厨师要“诈盲”、抓楼面要“松手”、抓买手要“耳利”。所谓“诈盲”,老板对厨师“偷”吃不要“眼针针”,偶然撞着也当不见。以免他们为了掩饰把吃的倒了,你转脚他再来,是为“双蚀”。防拿靠店规:所有雇员离店一律徒手出门。要使厨师合理用料,用互相监督,赏罚分明来制约。“松手”是老板不插手顾客给服务员的小费,优秀店伙,老板另有赏赐。“耳利”是老板经常逛市场,对物价行情敏感,如此能多少捆住“打斧头”的手脚。

另外是堵塞最难防止的内耗,对付员工“石灰擦咀——白吃”的办法,是要他们自我封咀;即精打细算地提高员工伙食水平。天海楼做法:早餐所有雇员一律每人一碗足分量的及第粥加蛋连油条。天天如是,食量最大的也能顶到下午中饭时,不然每人起码白吃点心二碟,代价(含浪费工时)要比及第粥成本多得多。

对外竞争花样翻新。竞争焦点是争顾客,故以质量第一,肴点质量标准是料鲜、味美、新颖、变化以及实惠,迎合北海人讲新鲜和“镬气”品味习惯。茶市竞争首在每周更新的“星期美点”,每天扛水牌敲锣过街,家喻户晓,各以一、二“拳头”品种拉客,如西施楼的芋角,天海楼的鸡球大包,上海楼的灌汤包,珠海楼的虾饺……备擅其长。这些“拳头”品种,格外精美而实惠,但应市有限,迟到有向隅之叹,各靠这手稳住阵脚。此外,茗茶多种、新鲜兼水美亦不能疏忽。酒宴方面,天海楼的烧乳猪,珠海楼的鱼翅,上海楼的炒响螺,西施楼的白切鸡……都是脍炙食客之口的名菜。

服务质量与内容。女招待除了殷勤热情的基本功,紧要的是“灵醒”,茶水添加不待叫,上菜及时不会错,顾客发火不还嘴。北海美食家(俗称相家)有帮派体系,得罪一个或一次挨“斩”,顾客被拉走一批,此风犹存。为了出奇制胜,还要新招迭出。20年代,大东酒店特从广州聘来女招待,轰动社会,天海楼生意被夺走一半,后来竞相仿效,是北海有女招待之始。于是天海楼设戏剧茶座挽回狂澜;西施楼设女伶(唱粤曲);上海楼设故事坛;珠海楼发挥唯一高层建筑优势开通宵的天台夜茶。开创了茶居行业的昌盛史。

上述无意厚古薄今。当今酒家如林,档次之高,非昔日可比。如能打破茶点

和菜谱单调化和固定化格局，恢复尚仍缺失的传统品种，改变短期效应的经营方针，开拓细水长流的平民化客源，围绕高质量合理收费而出奇招，将会迅速走出低谷，秀出同业之林。生财有道，惟“道”是导。

(《北海日报》1994年9月12日)

北海历史文件

《烟台条约》与《续增烟台条约》

北海第一次对外开放是在1876年9月13日(清光绪二年七月廿六日)，中英两国签订《烟台条约》(又称《芝罘条约》，烟台北有芝罘山故名)开始的。条约签订是因为英国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的所谓“滇案”事件诱发，英国借口“善后”，向清政府要索更多特权而单方面提出谈判，最后以清政府屈让出卖主权代价而达成。从谈判到双方签字交换文本，都在山东的烟台举行，故条约有以上称谓。

条约签订后，英国对于其中稍为有利于中国的“洋药”(鸦片烟土)“税厘并征”的条款并不履约，借口延宕。在中国朝野舆论压力之下，清廷中的顽固派代表慈禧太后才不得不用儿皇帝光绪名义，于1883年2月19日(清光绪九年正月十二日)下一道《上谕》，责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案向英方提出交涉，因此才有在1885年签订的《续增烟台条约》出台。

关于《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谈判，中方全权代表是“大清钦差便宜行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英方全权代表是“大英钦差驻华便宜行事大臣、勋赐三等宝星威(妥玛)”。双方代表于1876年8月21日(清光绪二年七月初三日)开始在烟台作外交礼节性接触，8月31日(七月十三日)进入实质性谈判，9月13日(七月廿六日)达成协议，双方签字交换文本。

条约分“正本”与“专条”两部分，共4条16款。

第一条六款。内容是“昭雪滇案”。包括为马嘉理平反正名。中方赔偿英方被害人员恤金银20万两；派使臣向英廷递交“抚慰”玺书(由光绪帝加盖“御玺”的，代表中央政府的屈辱外交文件)；而且规定玺书初稿事先送英方“审阅”认

可。另外是有关《滇缅边界通商章程》拟订的意向和程序；同时准许英国官员进驻原本属边境禁区的云南大理“察看”等等。

第二条三款。是关于外国驻京大臣以及各通商口岸领事官与中国官方外交接触的《礼节章程》拟订程序、两国“审办英侨犯罪案件”的有关规定等。前者是因为中国官场传统的跪叩礼仪，西方外交官接受不了，所以压中方另行制定一套迁就西方官员行之有素的所谓“文明”的礼节制度。后者是“领事裁判权”，由英方单方面修改；即英侨犯罪原定由英方当地领事馆单方“惩办”，改为由英国政府添派按察司官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审理。对于犯有“人命盗案”的英侨重犯，受害人只能向唯一设在上海的英国“承审公堂”控告，中国官员“只可赴承审公堂观审”。中国官员认为“办理未妥”的，允许“逐(条详)细辩论”，但终审定案权操诸英万。

第三条七款。是关于(扩大)划定除通商口岸免收洋货厘金以外的范围；同时添开湖北的宜昌、安徽的芜湖、浙江的温州和广东的北海4处为开放的“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对于四川的重庆，只许英方官员进驻，英商不得居留或经商；长江沿岸安徽的大通、安庆；江西的湖口；湖北的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洋货可享有免征厘(金)、(关)税的优惠；对新、旧各通商口岸租界线的洋人居住区，“应由英国领事馆会同各国驻华领事馆与(中国)地方官商议(重新)划定界址”；还规定：鸦片进口的厘金税虽然统归中国新关(即常关)办理，但是必须附带关于洋货进口和土货出口的关税优惠地区；由原来只限于通商口岸范围扩大到“沿江、沿海、沿湖以及陆路各处不通商口岸”，亦即全国范围的条件。此外，香港洋面税收稽查，原本事权不专，改由中英双方协同进行。

以上条款，必须于半年内实施执行。

另外的《专条》是关于发给赴西藏“探访”通往印度线路的英员的凭照；即向他们大开绿灯的问题。

尽管条约成文规定双方对各条款保证在半年内实施，但是对其中稍为有利于中方的细节，英方却单方面拒不执行；例如条约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洋药一宗……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中国)新关派人稽查封存

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新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省勘察情形酌办。”象这样对中方仅有一点可怜的主权的条款，英方竟然故意“延搁数年，迄未开办(执行)。”所以光绪帝后来在《上谕》责成“出使大臣商办”，以落实该条款的执行，致有《续增烟台条约》的签订。

关于《续增烟台条约》

《续增烟台条约》签订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是对《烟台条约》第三条各款有关“洋药”税额以及杜绝外商走私贩运办法的具体化和实施化。是中国为了维护主权的最后阵地，主动提出签订的。

条约有10条10款。其中第三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洋药”进口后，只许华人照章纳税贩运，“不许(洋商)持用凭单(税票)运寄洋药；不许押送洋药同入内地”等等。单凭这一条，就使清政府每年增收厘税600万两。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的一次外交胜利。

条约谈判的中方代表是“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谈判对手是“英国外部大臣会议”。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曾纪泽其人。

晚清杰出的外交官曾纪泽

曾纪泽，字劫刚，湖南湘乡人，大学士曾国藩之子。以父荫补户部员外郎。父死，袭承侯爵。光绪四年(1878年)充任出使英法大臣。光绪六年(1880年)接替崇厚出使俄国大臣，争回伊犁部分领土主权。法越之战，与法国打交道，“抗辩不稍屈”。十年(1884年)，晋为兵部侍郎，次年与英人议定洋药厘税，订《续增烟台条约》，“岁增(厘税)银六百余万两”。十二年(1886年)，先后“调户部，兼署刑部、吏部等侍郎。”十六年(1890年)病死。是晚清时期以干练和才辩著称的外交家。

在条约谈判过程中，他能坚持“保我中国主权，势不能以柄授人”的爱国主义原则立场，在关键问题上，与对手进行艰苦的斗争，终于使对手“就我范围”的让步。这在当时中国无论在政治、国力均处劣势的条件下，达成这个多少挽回一点国家主权和体面的外交文件是难能可贵的。

(《北海日报》1996年4月25日)

除旧布新的榜文

机缘偶合，去年12月4日，正是北海解放46周年纪念日，人民政权的北海第一任行政长官——北海军政委员会主任谭俊同志回到北海，当日约见笔者，提供了笔者多年希望得到的北海历史文献——《北海军政委员会接管通告》原稿打印件。对此笔者十分珍重，妥为收藏。这份“军管字第一号”的除旧布新榜文，宣告北海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终结，北海人民政权运作的发轫，也是北海市新编史页的弁言。全文照录，以飨读者：

北海市在我解放大军英勇作战及各界爱国人民共同努力协助之下，已最后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匪帮，于十二月四日获得了光荣的解放。国民党在北海的反动统治，从此即宣告最后结束，今后北海的政权即为人民所有。北海军政委员会已奉命组织成立，自即日起正式开始进行北海的接管工作。所有以前国民党在本城所管辖的一切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企业、公共事业以及官僚资本所经营的各种业务的负责人，均需将其组织内的各级人员、财产、档案、设备、武器、业务等分别详细列册，限于通告三日内一一移交本会接管，凡能将其本职所有的一切完整移交者，本会当予分别奖励；如有弃职逃匿，抗不移交或隐藏盗窃破坏各种物资、档案、武器、建筑设备者，本会必按情节轻重彻底究办。至于各级员工，无论移交前后，均须继续在原职服务，不得懈怠，并望勿相惊崦傍徨。特此通告，仰各遵照。

北海军政委员会 主任 谭俊

副主任 徐永源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

与通告发出的同时，军政委员会亦组织成立，正副主任之下设财政、交通、民运、文教、卫生、航政、供应等7个科和秘书、庶务2个处，公安局与主任室1局1室等机构。

12月9日，全面展开接管工作。10日至20日，先后接收原东、西两镇镇公所；同时成立东、西两镇人民政府，委何国达、姚为政分任东、西镇镇长。派陈炳洲接管法院、监狱，派×××接管警察局。任命劳锡王景为人民监狱所所长。

民心粗定。军政委员会工作重点立即转到支援解放涠洲岛和海南岛方面来。

(《北海日报》)1996年12月12日)